



Fudan American Review

美国问题研究

2009/2 (总第九期)

- 沈丁立 中美关系40年：回顾与前瞻
- 梅仁毅 奥巴马的当选——美国又一周期的开始
崔戈
- 周琪 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援助的目标和方法
- 檀有志 错位与调适：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探析
- 刘永涛 美国国会、总统和对华政策：若干变化、争论和议题
- 宋国友 美国与东亚金融合作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世界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问题研究(总第九期)/沈丁立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12

ISBN 978 - 7 - 5012 - 3774 - 6

I. ①美… II. ①沈… III. ①美国—研究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0811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封面设计 嘉 维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马莉娜

书 名 美国问题研究(总第九期)
Meiguo Wenti Yanjiu
主 编 沈丁立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1092毫米 1/16 13印张
字 数 222千字
版次印次 2010年3月第一版 2010年3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774 - 6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特约文章

- 中美关系 40 年：回顾与前瞻/1 沈丁立
- 奥巴马的当选
- 美国又一周期的开始？/15 梅仁毅 崔 戈
- 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援助的目标和方法/33 周 琪

专题文章

- 错位与调适：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探析/58 檀有志
- 美国国会、总统和对华政策：若干变化、争论和议题/82 刘永涛
- 美国与东亚金融合作/99 宋国友

青年论坛

- 1972—2006 年中美双边条约的缔约问题之思考/114 王 勇
- 进步时代美国总统预算权的演进及其意义 144 张树剑

学术评论

- 试析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走向
- 评《美国在亚洲的角色：亚洲和美国的视角》/157 吴 琳
- 重塑民主理论之公众形象
- 李普曼的重要著作《幻影公众》/164 林牧茵

学术交流

- 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地区安全/173 蔡翠红

特约文章

中美关系 40 年：回顾与前瞻

沈丁立^①

【内容摘要】 中美关系正常化已有 30 年。本文回顾中美建交以来 30 年的 3 个发展阶段，并展望未来 10 年的可能方向。中美建交背景特殊，其正常化留下历史话题。但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外来催化，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国际合作，增进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并在全球化时代使我国走向和平发展的强国之路。

本文指出中美建交后第一个 10 年的特征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美战略妥协”。这期间中美在安全利益上互有借重，形成了特殊的战略合作。第二个 10 年的特征是“中国韬光养晦，中美调整关系”。这一时期国际格局随冷战结束出现重大变化，中美克服双边关系中的严重困难，逐步恢复和扩大合作。第三个 10 年的特征则是“中国抓住机遇，中美扩大共赢”，这期间中美面临炸馆和撞机等严重事件，但双方以共同利益为重，慎重处理问题，并借反恐与金融合作，稳固并加深了两国互信。这一时期，中国国力显著增长，提前实现全面小康。展望未来 10 年，中美关系有望呈现“中国更加强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局面，世界体系将重新构建。

【关键词】 中美关系，国际格局，关系正常化，战略合作

^① 沈丁立，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2008年，是当代中国决定改革开放的30周年。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决定将国家发展的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包括国际合作的方式，来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①

在中共中央做出改革开放重大决定后的第十天，也就是1979年1月1日，中国再次做出战略决策。这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这项决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外交战略进行的第一次重大调整，是我国沿着改革开放思路的核心举措，对之后的中国外交和国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推动我国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定向、催化和加速作用，迄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未来前行的轨迹。

光阴荏苒。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走完了3个10年，中美两国也于2009年迎来了建交30周年。本文回顾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各个时期的国际背景，提出双边关系的核心特征和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并对下一个1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向做出基本判断。

第一个10年（1979—1988）：改革开放、战略妥协

中美建交是在我国内外特定形势下发生的。^②对中国而言，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一严重内乱后，国民经济亟待振兴，国民人心思定。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复出后，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得出世界大战不会马上发生以及可以避免的战略判断，进而将国家发展引上了经济建设的方向。在终结了延续10多年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轨道。

与此同时，中共将“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发展方略调整到全方位的经济开放合作，不再强调凡事独立自主，而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

^①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40—153页。

^② 对中美建交的背景，参见陈一新：《断交后的中美关系》，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

中美关系 40 年：回顾与前瞻

工与交流，发展有利于我国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国内外各种经济因素，同各种有利于增进中国当代生产力进步的生产要素进行广泛合作，执行了一条引进外资、技术与管理、促进外向型出口的贸易立国政策。中美结束长期以来的全面敌对状态，使得中国得以更为安全地推进经济发展战略。过去 30 年中美两国在经贸和其他领域的大规模交流合作，催化并从整体上保障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稳步前进。

中美关系正常化曾面临诸多困难，其核心障碍在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顾虑。中美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差异悬殊。美国奉行市场经济和反共立场，而中国曾长期采取计划经济，提倡扩大公有制，反对垄断资本与垄断资产阶级。在国家安全领域，我国曾同时面临来自“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形成的威胁，美国则同时对抗苏共和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认为后者的威权主义与美国所倡导的“民主自由”格格不入。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将中国国民经济严重不振与美国对华形成的意识形态威胁相比，中国认为后者并未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虽然承诺以武力保障台湾的安全，但当时台湾仍然主张“一个中国”，并在事实上已经放弃反攻大陆。甚至在 70 年代早期，将美苏分别对中国形成的持续安全压力相比，中共就已得出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超出了美国对华威胁的判断。因此，发展国际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美国展开安全合作，将更有利于当时中国的总体利益。为此，在进入 70 年代后，北京逐步调整了安全观念和意识形态，对安全威胁做了新的排序，在世界范围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择机开展了安全协作。中国在决定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方采取了务实的发展逻辑，不再一味地反对市场经济。中国执政党在新的发展理论创建和完善的同时，就开始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

中美关系正常化，给中国带来了重大的战略利益：它改善了中国当时面临的外部安全处境，不仅塑造了同反共的美国政府较前正常的关系，而且牵制了当时对中国形成重大安全压力的苏联，并提供了中国对其南方某邻国采

^① 中共在 1982 年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

取军事行动时与华盛顿的战略默契，扩大了中美的地区安全合作。更为重要的是，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了我国进行经济体制变革的发展动力和合作资源，为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创造了外部环境，从而增进了中国的和平进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从最初的经济变革不可阻挡地走向了国家体制现代化的全面强盛之路。

在中美建交后的前 10 年中，我国取得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安全和发展空间。因“文革”而迁入三线的大批国防企业和研发机构部分重返沿海地区（不然，2008 年因四川省北川地区地震对我国所产生的破坏作用将更为严重）。在这 10 年中，我国开始吸引来自境外的投资，在制造业与科教等领域开始了国际合作。中美建交又推动了西方一批国家承认中国，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虽然当时的中国整体国力依然十分有限，但它仍然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了相对有利的地位。

毋庸讳言，中美建交也留下历史话题。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自尼克松总统 1972 年访华以来，美国迫于前苏联的全球扩张压力，在美台断交、从台撤军以及结束美台共同防御协定三个方面，满足了中国的正当要求，但北京和华盛顿未就必须以美国停止对台售武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提达成一致。在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又迅即制定《与台湾关系法》，对华进行牵制。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中美分歧重大。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事实上留下了悬而未决的严重障碍。客观上，只要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中美两国建交后仍受到美国的损害，就不能认定中美关系已经正常化。所谓的“正常化”，只是相比较于在两国缺乏正式外交关系并处于严重对抗的时代。在严格的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个过程，而非已经出现过的时刻。但从历史角度看，上述问题反映了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以及双方当时对安全合作的迫切需求，反映了中美双方外交理念中的现实主义。在当时各自的内外形势下，中美能够成功建交，双方进行妥协，已是两国在彼此利益的共同诉求下较为务实的博弈。^①

^① 参见胡为真：《从尼克森到柯林顿：美国对华“一个中国”政策之演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

中美关系 40 年：回顾与前瞻

在台湾问题上，上世纪 80 年代台湾当局仍然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并未凸现为爆炸性问题。尽管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而且里根政府继续推动对台售武，但在中国政府压力下，中美两国于 1982 年达成公报，^① 美国承诺将对其向台军售进行更多限制。同时，美国也开始对中国输出防御性武器装备，中美安全合作内涵加深。中国协助美国获取苏联在华周边从事核武器试验的有关情报，而美国则向中国提供“黑鹰”武装直升机，并计划通过“和平珍珠”计划协助中国空军提升歼 8 战机航电系统的空防穿透能力。在里根总统执政的中后期，中美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安全合作，两国关系呈现准战略合作的特性。^②

第二个 10 年（1989—1998）：韬光养晦、调整关系

在上述中美建交以来的第一阶段中，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以美国等为主要借鉴对象。中国的文教与科研发展逐步摒弃苏联模式，开始向美欧等学习。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运作中，中国也注意学习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之成功经验，包括学习美国在市场和法制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美因此启动了大量的交往与合作，这一阶段的中后期，中美两国的关系总体是平衡的。

但是，中美关系在 1989 年夏天遭遇严重困难，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内部事务进行了干涉。1989 年，美苏继续缓和，而冷战接近尾声。在“八九政治风波”后，美国对华实施制裁，中美两国公开的官方往来几近停滞。风云转换之际，中国领导人提出“韬光养晦，冷静观察”的指导方针，巩固周边外交，改善大国关系，坚持改革开放，不久就打开局面。1991 年和 1992 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和天皇明仁先后访华，促动了西方同中国逐步恢复高层官方往来，美国方面与中国政府的交往也逐步从低调走向了公开。^③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1982 年 8 月 17 日（亦称“中美 8·17 联合公报”）。

② 沈丁立，“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及两国关系的本质”，载谢希德、倪世雄主编：《曲折的历程——中美建交 20 周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5—63 页。

③ 钱其琛著《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1 版，第 165—201 页。

1993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正式会晤。双方确认: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国家,两国对确保世界和平都负有重大责任。美方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作用,希望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中方认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双方从国际形势全局出发,用长远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通过这次会晤,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峰会机制得到了恢复。

尽管中美两国关系趋向改善,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两国交往仍然存在四大障碍。其一,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分歧严重。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提升对台售武的水平,输出大量先进性进攻武器,既不尊重中方主权,也不遵守其相关承诺。其次,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对华动辄指责,甚至威胁将此与双方经贸挂钩。第三,就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对华施压,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对中国指责。第四,在防扩散问题上对华一再制裁,而它自己却向台湾方面输出先进常规装备。对上述问题,中美两国采取了分类管理的务实办法。本着有效管理并解决问题的宗旨,中美双方逐步建立起各种专业性的谈判和协商机制,在整个90年代逐步展开全方位的对话,使双边关系在上述所有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在整体关系上,两国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美国允许台湾地区时任领导人访美给中美关系带来的严重冲击后,开始重新审视和定位双边关系,一度确定了中美“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华盛顿再度明确了同中国的接触政策,双方元首于1997年和1998年分别向对方进行了国事访问,显著缓和了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的僵硬关系。^①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从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到越来越认识到处在社会重大变迁时期的台湾地区时任领导人利用民粹推进极其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及其严重危险,认识到此种“麻烦制造者”的行为对美国利益的根本损害,因此开始了既利用但也牵制“台独”的更为复杂的对台平衡政策。虽然美国维持台海两岸不统局面的意图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其同时牵制愈

^① 《中美联合声明》,华盛顿,2007年10月29日。声明表示:“两国决定,中美两国通过增进合作,对付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美关系 40 年：回顾与前瞻

演愈烈的“台独”做法，在客观上扩大了同中国在反“台独”问题上的共同利益面，一定程度上使美国成为在这个问题上较前更为负责的利益相关者。

在人权问题上，克林顿总统随着执政经验的增强，逐步认识到将中美经贸关系与人权问题挂钩无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因此主动于 1994 年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文章，承认其挂钩政策的失误。随着美国开展“分类处理分歧性问题”的务实性外交，中美两国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也共同步入了对话，两国的人权问题逐步地不再成为不可讨论的禁区。中美在各个具体的经贸领域展开了经常化的磋商与谈判，双方根据具体情况互作让步，各作谅解，兼顾各自国家利益与共同利益，从而在这个 10 年中大大推动了对各自市场的更深准入，并为中国在新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防扩散和地区安全层面，中美从 90 年代中期起加大力度调整在这一方面的关系，逐步将这一纷争领域转变为合作亮点。美国从单向制裁转为寻求有效合作，其行政部门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良性互动，旨在解决问题。中方则显著提升对核生化导等战略物项和敏感技术的国家出口管控，在经济与安全的综合利益上取得妥善平衡。^①中美在防扩散方面的这些良性互动，在新世纪又延伸到在有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平台上开展合作，协力促朝鲜弃核。北京和华盛顿在伊朗核问题上也在加强合作，在尊重事实与国际法基础上，处理好伊朗享有民用核能的权利与承担相应责任之间的平衡，限制伊朗将民用核能技术转化为其他目的之可能。

在这一阶段，中美关系步入了冷战后时期，双方在冷战期间形成的结构性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代巨变促使中美对自身和彼此重新定位，审视国家利益发生的变动并思考各自关系再稳定化的重要性与模式。这期间中美关系出现过重大波动，在台湾与人权等问题上全面较量，甚至为台湾问题而出现双方海军在公海对峙的严峻情况。但这个阶段也为两国战略精英思考中美关系与人类和谐进步的关系提供了时间，为两国关系发展到不受或少受国际

^① 详见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防扩散政策和措施》白皮书，北京，2003 年 12 月 3 日，以及《中国的军控、裁军和防扩散努力》白皮书，北京，2005 年 9 月 1 日。这两个文件对中国防扩散出口管制政策现状以及最近十年以来中国相关政策的演变进行了阐述。

环境影响的更成熟阶段做出了重要铺垫。

第三个十年（1999—2008）：抓住机遇、扩大共赢

中美关系在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一段较短的稳定期后，在 1999 年再次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的严重损害，并在 21 世纪初面临由于美国军机抵近中国侦察而导致两国军机相撞的严重事件。尽管这些事件的性质相当严重，在两起事件中中方的人员和物质均遭受了损失，但中美双方仍对这两起危机进行了基本有效的管控，从中美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创造性地、妥善地处理了这些事件，维护了两国关系的整体性持续发展。

在中美建交以来的第 3 个 10 年中，两国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首先，由于中国成功地管理了对外关系，获得了集中精力发展和开放的重要机遇。这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绩，中国快速从地区大国迈向世界大国，并逐渐呈现世界强国的一些征候。与此相随，中美各自的国内政治议程也开始更多地影响着双边关系。其次，在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台湾问题上，一段时期以来不断加剧的“台独”发展事态也更多促使中美为维护台海现状而形成某些共识并采取合作。自 2002 年以来，美国时任总统布什一再表示“不支持”甚至“反对”“台独”，美国行政当局已反复强调维持台海两岸现状的重要。

在这个阶段，中美核心的安全合作是共同反对恐怖主义。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的严重打击美国的国际恐怖事件，不仅对美国本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袭击，而且对美国应对空前危机的能力提出了重大考验。布什政府因此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并对外发动了两场战争，明显应对失当，铸成更为严重的危机，迄今无法收场。美国反恐需要国际合作，国际恐怖主义迅速上升为布什政府的首要国家安全威胁，中美在国际反恐中开展合作，提升了双方安全信任和合作。中美两国不仅快速走出两国军机相撞形成的危机，而且在布什执政 8 年的多数时候，形成了较长时间关系稳定的局面，中国确实预言并实现了“重大战略机遇”。同时，这个时期中美在防扩散、地区稳定、开放

中美关系 40 年：回顾与前瞻

市场等方面，双边关系的基本面都保持了长期合作的态势。

在此阶段，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推进，中国从实现初步小康，开始走向更讲效益和和谐的科学发展，更加重视可持续进步道路。关注社保、关注人权已成为改善政府与民众关系、改善劳资关系的重要特点；关注环境与生态也已逐步成为国家调整环保政策的主要动力，而这些问题的改善，不仅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有利于增强中国的现代化制度建设，还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合作，包括在新世纪中同美国的合作。

这一时期，中美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差距在显著缩小。中国在中美建交以来前两个阶段发展的基础上，最近 10 年的经济产出又翻了两番。用官方汇率计算，中美经济规模的差距已从 2000 年的 1:10 迅速缩小到 2008 年的接近 1:3。按购买力评估，中国的年度经济产出已近美国的七至八成，并将在 21 世纪第一个年代结束之时赶上美国。^① 在美国国内，也出现了要求重估中美两国汇率以调整双方投资与贸易关系的更多呼声，虽然这不断给两国经济关系平添压力，但也促使双方寻找新方式以策互利协作。在布什政府时代，“中美战略（高级）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因此应运而生，并进而提升至奥巴马总统时代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些新的高层对话平台，在阐述中美各自的发展观，纾解并利用各自内外压力，整合两国各自的行政资源，经由妥协促进经济互赢合作等方面，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一度严重干扰中美关系的台湾问题，在经过 10 多年的连续波澜之后，在中美迎来建交 30 周年前夕开始降温。一方面，中国持续的力量兴起正在深刻地重塑着中美关系，使之更为平等和积极，并影响着美国对台海两岸的政策朝着更加务实的方向调整。在 21 世纪第一个年代，美国先后面临国际恐怖主义严重打击和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国力受到严重牵制，这就影响了美国力量的全球投放，迫使其在非核心安全领域进行收缩，包括在台海问题上部分调整政策。另一方面，大陆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因此取得的自信与塑

^① 沈丁立：“中美关系与国际秩序”，东方讲坛办公室主编：《东方讲坛 I》，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 年 1 月，第 18—28 页。

造力，也在从正面推动两岸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颠簸，引领它朝着更为稳健共赢的积极方向前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发展良性成熟的双边关系，也就出现更多机会。

在这一阶段的尾声，从美国开始爆发的世界范围的金融风暴，对美国形成比“9·11”恐怖袭击更为严重的挑战。“9·11”事件打击的是美国政府和经济中心，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对多年来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反制，但其手段却为现代文明所不能接受。但2008年年底起发生的金融危机，则是对当代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挑战，它所危及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其后果为“9·11”袭击所完全无法比拟。尽管中国已深刻卷入全球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但这场危机对中美造成的后果异同不一。相同者，在于对两国民众的生活方式都提出了质疑：美国人的超前消费造成它的金融过度透支，而其新型金融衍生品又不被政府和专业机构合理监督；相异处，对于中国，其实体生产的财富未被充分消费，又转而投资美国的虚拟经济，可能助长了美国金融危机的风险。鉴于中美经济关系已经高度依存，在极其严峻的危机面前，中美已经没有“去耦合”的选择，只能同舟共济，相互支持，继续合作。

这10年中美国面临的两大危机，前者给了中国机遇，因为中美利害关系还相对独立，中国还有多项选择，只是中国选择了合作；但后者却把中美真正归入利益相关者，中美除了合作，别无选择。中美关系30年发展所形成的如此同质化的关联，恐怕是30年前决定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策者所不能预见的。尽管中美双方各自失去了一定的政策选项，但彼此紧密的相互依赖更形成了事实上的经济共同体现实，这就是现在和未来中美双边关系持续稳定的成因。

下一个10年（2009—2018）： 中国更加强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

中美建交以来30年关系的发展，同时是一个不断开放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开放与合作，形成其实力不断积聚，也为未来10年的国家发展打下了更为

中美关系 40 年：回顾与前瞻

坚实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进步，又同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息息相关。由于这个正常化是个过程的概念，不仅中美关系还在继续正常化中，它还直接促进了中国国家建设的正常化，使中国在经受了百年屈辱与共和独立后，逐步向现代国家制度文明的正常化趋进。就此意义出发，中美建交与中国现代化存在密切关联。展望下一个 10 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还将越来越同中国的实力与能力相联系。

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在根本上，中国制度优势仍给这个国家提供独特、强大的行政整合能力。中国改革开放给国家提升的竞争力，正为国民权利与社会安全保障提供更多的物质基础。这充分体现在国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国家地位的上升以及和平发展的环境保障等各个方面。在各国、各地区相互作用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中高速发展的内外要素尚无发生根本变化：国际流动资本的继续大量存在，中国小康社会继续发展的上升空间，国际社会对共赢哲学的普遍接受等等。即使国际社会面临严峻的金融危机，这不仅没有也不可能摧毁西方国家的消费和生产动力，反而推动着中国进入重视内需、调整产能、提升效益与环保的历史性新阶段。

在改革开放中，中国政治也正在发生重要革新。中央与地方关于权力分配的博弈，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正有序展开，国家治理将进入更高境界。这些都要求中国在保障民主、法制方面继续推进，在市场经济与环境生态保护上谋求更大作为，从而消弭内外张力，预防各种危机，真正建设和谐社会。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已经在 2008 年提前实现了中共 16 大与 17 大提出的预定到 2020 年才实现的全面小康要求，即计划在 2020 年国民经济产出比 2000 年翻两番（16 大提出的目标，即从 1 万亿美元提高到 4 万亿美元），或 2020 年国民经济人均产出比 2000 年翻两番（17 大提出的目标，即从人均 800 美元提高到 3 千美元）。在 2008 年，我国的国民经济产出已经超出 30 万亿人民币，按当时官方兑换率已达 4.4 万亿美元，人均则达到 3300 美元，均提前 12 年实现全面小康的两个核心指标。按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水平，我国经济规模即将超出日本的水平。依照这种中高速发展，即使未来 10 年我国只是连续“保八”，我国在 2018 年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将在“全面小康”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 9 万亿美元，大大缩小同美国的差距，在购

买力上则有望超出美国的规模。所以，未来 10 年是中国战略崛起的年代。

另一方面，在计入未来 10 年仍可预期的中高速发展后，新中国成立后 70 年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40 年的高速崛起，已经并将继续给现有国际体制带来深刻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力量的成长，将有望改写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西方长期主导的国际秩序将开始进入东西方力量对比更为均衡的新国际体系。同时，在未来 10 年，美国必须面对其经济力量继续相对缩小的局面，其相对竞争优势有可能进一步削弱，这也意味着随着中美合作的发展，中美竞争的局面将可能扩大。

在未来 10 年中，世界有望逐步看到这样的变化：一个稳健的中国需要以成熟的步伐，在现有国际法框架内和平地发展。而一个成熟的美国，面对和平崛起的新的世界级国家，应有充分思想准备予以接受（或不得不接受）。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必须是以讲规制并且是以和平方式发生的。

在未来 10 年中，有利于中美合作的领域将更加宽广，在政治法律、经济金融、文教体卫、全球与地区安全的众多方面，中美互利合作的成长空间十分辽阔。与此同时，中美在科技与军事竞争、经济公平与开放、全球市场与经济秩序、台湾问题等方面还将保持程度不同的矛盾，在局部问题上有时还可能出现激化。在多边问题上，双方的合作与竞争也会同时加深。在某些领域，中方会分享美国主导所形成的国际稳定等公共产品；在另一些问题上，中美必须共同合作以促进各地区的稳定。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矛盾与竞争，还有赖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通过发展来创造资源从而解决问题。譬如，在保障能源的国际供应问题上，中美矛盾的核心并非提高能效，也不是减少能耗，而是开拓新能源，包括能给未来人类社会提供千万年的热核燃料或其他零碳或低碳新能源，这是谋求经济继续增长并同时改善全球气候状况的唯一的根本性途径。

在 21 世纪初，中国已经抓住了重要的战略机遇，在重大国际事变中以稳健的姿态，以和平发展理念，以非传统安全为抓手，成功地推动了与外部世界的持续合作。未来 10 年与美国的合作，仍将是这个时期中国发展的关键。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和平发展的模式已为世界广泛熟悉与接受，中国作用在解决地区与世界重大问题中已不可或缺。中方为未来 10 年中华民族的

中美关系 40 年：回顾与前瞻

战略崛起正在做重要准备，有理由期待中美关系将发展得更为平等与稳定，并且通过两国合作形成世界的持久稳定。^①

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战略后果，将平衡跨太平洋两岸的战略关系。一方面，中美双方已经创造了多重交叠的政治安全沟通管道，具有及时沟通、增信释疑的良好条件，形成了预防和管理危机的一定机制。像朝鲜战争初期那样中美缺乏信任与沟通条件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中美都是世界上具有超级战力的国家，都具有进行高烈度常规战争或大规模毁伤性战争的能力，双方都难以接受严重军事对抗的后果，各方必将予以避免。再一方面，两国在经济合作、稳定国际形势、防控大规模传染病等问题上有大量共同利益。因此，中美必定要发展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

未来 10 年中国国际地位的更高崛起，对中美关系带来根本性的稳定作用。这是由于中国以我为主提升能力，同时这这也是一个借重美国并给美国反馈利益的过程。但是，即使理性的美国战略精英能理解中国国际地位的积极意义，他们必然还是难以接受美国相对地位的衰退。即使美国不会也无力以强制手段遏制中国，但还将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与中国锱铢必较，寻求在经济共赢过程中的相对与绝对的赢量，以及在维护国际安全秩序中确保美国的利益。因此，可预见在未来年代中，也就是在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必然发生大量关于利益分配公平性的纷争，包括对财富产生过程中劳工权利与环境保护的争论，包括经济发展对气候改变等跨界问题的影响。但这些都是发展中利益平衡的问题，属可争可控范畴。

结 语

中美已经走上了由现实主义所决定并可预判的关系稳定的道路。中美都追求和平，问题是谁治下的和平。中国宣示不寻求中国治下的和平，但也不

^①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第 17 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2007 年 10 月 15 日，北京）中国温和稳健的发展方略，有利于人类共赢，已作为一种新的文明模式受到广泛关注。

能接受在美国霸权治下于己不公的和平。美国尚不甘放弃霸权，但对维护由其治下的和平已感力不从心，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例证。美国发展的模式已取得相当成效，但也越来越显示出其固有弊病。向着社会主义方向移动，由国家政权保障更多普通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必将是美国社会改革的方向。随着中美力量差距的缩小，当前这两个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台湾问题，将有望淡化甚至根本解决。未来 10 年将为这一时刻的到来做出最后的准备。那一时刻，中国也可称成功崛起。那也将是美国纠正其外交政策中一个长期性根本错误、使其受到更多尊重的时刻。